

國父的遠見

二十世紀是民生主義撞場時代

羅時實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國父孫先生為在東京創建之民報撰發刊詞，是他首次說出三民主義的輪廓。茲節錄其中重要的一段：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增，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撞場時代也！」

這一輪廓最早是美國總統林肯在為解放黑奴而引起之南北戰爭接近勝利之時，因一時靈感而有此構想。不幸林肯遽爾謝世，未及將這民有，民治，民享之偉大構想，作詳細說明。國父說他主張之民族，民權，民生，就是林肯總統所講的民有，民治，民享。此在當時情形，除推翻滿清為多數國人之共同願望（自然不包括當時的皇族，旗人，和少數漢官），民族主義具有振奮人心作用，最容易為黨員了解與接受。民權主義精神雖在中國古已有之，其實行方式則由西方創始，因在這同年創立同盟會是以留學日本歐美的知識份子為組成主體，耳濡目染，故對民主政治有所愛好。只有民生主義的內涵在歐洲因派別紛歧，未獲定論，不僅一般知識份子感到新奇，即其領導之國民黨員，直至民國建立，仍有不少人持反對態度，以為中國革命祇要有民族民權兩個主義，對於民生主義則認為不急之務。號稱當時政治一流人才的桃源漁父，就是這一派人的代表。

國父要在那時強調民生主義，要使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能同時解決，其主要關鍵首在順應世界潮流。因為西方國家已經發生了民生問題，一八四八歐洲各國的紛擾情形，殷鑒不遠，中國在事先就應有預防辦法，免得像西方各國俟病疴來臨，才去救治。國父認為世界上先後發生的問題歸納起來，都不外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之發生，

在時間上雖有先後不同，但是必須得到適當合理的解決。有一未能解決，至少在那一國家，會隱伏着將來的禍患。

其次乃為適應中國革命的需要。中國革命之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國民族永久獨立的生存。所謂「生存」，不僅指社會組織，和道德才智的優點繼續保持，最緊要的是要我們數億人口，在世界並存的國家之中，能夠發榮滋長，繼續存在。那時對世界局勢具有影響力的國家，都是經過產業革命，擁有雄厚的生產能力，因此他對中國革命的計劃，用心最多，致力最勤的，仍是經由工業化，使中國迅速成爲一個現代國家。

國父鑒于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倣效西方的生產方法，數十年內即躋于世界強國之林。他認為中國有廣土眾民，和遠比日本豐富的自然資源，在日本可以做得到的，在中國只要國家能夠統一，應該更容易成功。日本由一東亞小國變成世界強國之一，增加了國父建設中國的信心，但他却不贊成中國和日本一樣全盤歐化，他在日本歐化的中途，已經看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正在醞釀變化，認為中國如果像日本一樣，跟着西方工業革命的老路走，結果雖然可能享有若干年的繁榮，經過相當時期，將不免也會重蹈他們同樣覆轍。因為日本在接受西方物質文明之時，事先沒有加以選擇，盲從的結果，勢必同受其禍。

西方的工業革命，並不是一種預定計劃，也沒有那個要這樣做。在十九世紀初期，可說沒有那個會想像得到，將來機械化的進步會到達何種程度。將來可能的演變究竟如何？更沒有那個敢說，在此繼續演變的途中，會有一種學說或主張能夠把人的地位和組織，變得比宗教政治對於人類的影響還要深刻。我們在二十世紀後期要將歐美的工業革命作一評價，雖不能確定其利害得失，但其為人類歷史上二種巨大事變，則無可否認。但這種巨大事變只有旁觀的人看得比較清楚。站在圈子裡面的倒只有極少數的先知先覺，曾經多少看出一些。所謂產業革命到今日為止，仍在繼續演

變之中，新的確定和新的秩序，雖然有不少推測，但是權威的判斷，此刻還少有聽到。

民生主義的工業革命，便完全不是這樣。因為歐美工業革命的經過，都是我們歷史的參考。國父初去歐洲是一八九六年，那時歐洲已經有了許多社會主義學說，社會問題已達到嚴重階段。國父對於歐洲工業革命那種痛苦跋行的經歷，和因此產生對於進步的阻滯和衝突戰爭，以及一切錯綜複雜的情形——歐洲各國在他們由中世文明走入現代文明，所經歷次調整的痛苦，他都非常明瞭。他經過多年的研究和實地考察，乃至向專家學者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在計劃增產之先，必須對財富分配預先有詳密計劃，對於將欲建設的社會，事先有明確認識，利用西方科學與工業技術的成就，而以資本主義社會經歷的失敗作前車之鑒，這樣才能使生產與分配兩大問題，即產業革命與社會革命兩大問題，可以同時解決。

國父此一偉大計劃雖有甚長時期未獲國人諒解，亦未受到國際應有的重視，但至二次大戰結束，他對一個工業落後國家經由捷徑，使工業與社會革命同時加速開發之新奇構想，則已成爲時下潮流，爲經濟開發落後國家共同遵循的路線。在亞洲尼赫魯領導的印度，是以民主與社會主義作爲經濟建設的領導原則。埃及的納瑟亦堅持民族主義須和社會革命運動聯成一起，只有全國國民在政治和經濟上具有平等地位，經濟建設始能爲埃及帶來福祉。黑人非洲的經濟建設雖多數國家尚在起步階段，但強調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則已成爲多數政客的口語。近年出版有關經濟開發書籍也是循着福利路線，把公平分配看成優先。

因此便使我們容易想到，這和國父在這一世紀初期預言：「二十世紀將是民生主義擅場時代」完全符合。他早已看出這一時代是變化多端，而且是加速變化。由於知識發達，遂使「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因此他在中國發動的革命，是要使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以後來居上方式，趕到歐美國家的前面。

援外計劃的最早構想

林白樂教授 Paul Linebarger 1913-1966 曾以援外 foreignaid

爲例，指出國父在世界政治家對世局演變，比同時人至少能早見二三十年。

援外是今天很時髦的工作，美國做，蘇俄也做，戴高樂也跟着做過，西德和日本都做。甚至我們一方面在接受外援，同時也在輸出援外，像農耕隊樣一共有多少，我都計算不清。最好笑是共匪也在作東施效顰，把在國內榨取來的從前向印尼，現在還繼續向黑色非洲大量輸送。我現在要問這集體安全和援外的概念，最早是那一位有此構想？

這真可說是我們國父的創作。他看到世界經過首次大戰，參戰國戰敗的不說，戰勝的除美國日本而外，那一國不是創鉅痛深，在設法防止，不讓這類戰爭有發生機會。因爲大家都在策劃和平，這樣他才提出永久和平的計劃。他從根本上揭出產生戰爭的三種原因：第一是國與國間的戰爭；第二是商業利益的衝突；第三便是共產黨企圖發動的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他向當時的列強指出，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因爲沒有經過產業革命，人窮，多數沒有受到適當的教育，爲此引致列強覬覦，此時幸有一個均勢維持，萬一這個均勢打破，爲了搶奪中國，隨時都能引起國際的戰爭。

國父是中國人中第一個爲此大聲疾呼，中國人如不自己爭氣，不僅是中國人的不幸，而且還要貽禍人類，爲爭奪中國引致世界的戰爭。因此，要使世界得到和平，必須先在亞洲得到和平。中國人在亞洲佔了一半，向壞的方面走，可把亞洲鬧的稀糟。中國人能力爭上游，先把自己整好，便是亞洲的安定力量。他爲此提出「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要當時歐戰戰勝國，利用他們當時的剩餘物資，和復員之後一時不易安置的技術人才，幫助中國建立幾項基本工業，使中國走上現代化之路，提前爲一個現代國家。

假如這一計劃是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出，專就美國說，毫無疑問會被美國全部接受。因爲計劃中說，這是基於互惠的觀點而設計的。第一，中國有了現代的工業，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可以提高，除了解決中國的貧窮，對美國生產的精細機器和大的發動機，乃至工作母機，在若干年內將是一種大而極可靠的市場。第二，中國社會安定，生活欣欣向榮，像我們過去遭逢的共產黨的顛覆和滲透便不會發生，不會做別國的累贅，拖累別人。

現在大家都已了解，認為這是應該做的。可是那時美國當權的政治家並沒有這樣眼光。他們都在忙着向英國法國償還他們的債款。英國法國又盲目地不計死活，生吞活剝地硬向打倒了了的德國儘力榨取，對這一偉大計劃沒人理會。林白樂說，「一九四六年以馬歇爾計劃造成歷史聲名的馬歇爾將軍那時可惜還是一位年青軍官，對經濟學的知識還很粗淺」，以今視昔，這能說不是一大諷刺麼？

私營與公營並行的經濟

我們都還記得，四十年前一般人以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南轅北轍的東西。資本主義的主要條件是私有財產，自由競爭，讓個人有發揮其經濟天才的機會，放手創造財富。社會主義是要把生產工具歸社會公有，消彌勞資的階級。因為社會主義是反抗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而產生的，它的興起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攻擊對象，因此，他們認為這兩種經濟組織是兩個極端，沒有調和的餘地。但我國父却不是這樣看法。他認為這兩者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自由競爭，讓個人都有發揮天才的機會，這是好的方面。但對弱者也應予以保護；因為生存是他應有的權利，所以達爾文天演淘汰的學說不能適用於人類社會。消彌勞資階級是社會主義之主要目的，任何經濟組織都不能違反這一原則。但社會主義的弱點是沒有競爭，不容易推陳出新，比較難得進步。社會主義者雖然口頭都不反對民主，極權的共產主義却必然是獨裁的。

國父的民生主義是先從平均地權做起。那時中國各處的土地雖然並不值錢，但因中國遲早必然會工業化，等到工業都市成立，土地跟着人口增加而高漲，再謀取締已經來不及了。我個人的看法，漲價歸公的作用是要使大家了解，只有自己出過努力得來的才算是財富，不應收取不勞之獲。這是一種新的教育，也是新社會的行為標準。

在建立公平的行爲標準之後，他對工業建設的計劃是斟酌當前情形，劃分公營私營的界限，有些利於自由競爭的企業聽由民營。國家的任務是開創工業化的環境，從建立鐵路公路，發展全國的交通開始，諸如港埠的開闢，使全國生產能向世界輸出，世界的商品能經由幾個大的國際港埠深

入內地各省，使貨暢其流。此外便是基本工業的建立，如動力，鋼鐵、煤礦、機器與水泥工業等等，有了這些，其他輕工業才有所憑藉，必須先由公家經營，或經營至適當時期轉移由民間經營。

這種私營與公營並行的經濟，今天已在世界民主國家普遍實行。但在民國十六年以前共產黨不惜冷譏熱嘲，極盡詆毀之能事。他們的片面邏輯是只有把生產工具歸國家公有的，才算是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就是資本主義。他說我們民生主義經濟容許私營與公營並行，顯然是一種矛盾，當然算不上是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便是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便註定要被埋葬。這就是共產主義的片面邏輯。在抗戰期間我又和他們常在重慶見面，他們說的還是這一套理論。

私營與公營並存的經濟，現在正是各民主國流行的經濟。雖然在這些國家仍然有人願意保存資本主義的名稱，這時的所謂資本主義也絕不是十九世紀一般人指稱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原是由人創造的，由多數人經由民主方式採用的經濟組織，是以人為主體。在人人都有發揮天才的自由，可以使用全力創造財富，同時強調服務精神，在尊重生存權的原則下，大家都有適當的生活，那些具有特殊能力和天才的人，還是可以比照他們的能力和天才，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報酬。

至於社會主義也只是一種程度上的差別。今天的民主國幾乎沒有一個沒有社會主義的成份。英國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祥地，經過戰後工黨六年的統治，已有百分之二十的工業由私營轉為公營。美國一向標榜自由企業，他的郵政一向就是由國家經營。羅斯福總統任內屬於新政範圍的如 TVA 一類的公共工程，你能說不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麼？現在正在積極發展的原子能的和平用途，怎樣可以由私人經營？這當然也會是一種公營的企業。此外如太空之研究發展，乃至幾家大的飛機公司名義上雖屬私營，實際上公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已經混在一起，只有公司的會計師才能指出公私資本的百分比數。還有，美國兩三百家大的公司幾乎供應世界近半數的工業生產，假如你真懂他們內部的組織，也很難說出這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其餘如法國、西德、和意大利，大致都和這是類似情形。

至於像蘇俄和其他共產集團的經濟，根本就是一種失敗，沒有那一國

願意做行。蘇俄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也嘗試行過廢除貨幣和商業的「戰時共產主義」，行到委實無法繼續，才被迫又走回頭路，改行「新經濟政策」。今天蘇俄的經濟力量是從一九二八史大林執行的首次五年計劃開始，直至今日，他們的工人仍是為賺取工資而工作，為領取加班費而延長工作時間，為累積財產而努力工作。他們的工人和經理階級仍然是相差懸殊，其懸殊的程度也並不亞於美國工業界的情形。今天蘇俄的經濟最使共產黨人無法解答的，是和他們要埋葬的美國資本主義越走越近，和標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越走越遠。大陸匪幫一部份由毛匪領導的因此指摘他們是修正主義者。真的，今天蘇俄的經濟除了沒有由私人組織的大公司外，有那一點是和美國不同，這不顯然是一種矛盾的笑話麼？

在一九二〇 國父提出「實業計劃」之時，他在計劃未段之最後一句指出他的目的是要「使外國的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兩種人類文化之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世界之文明」。你看，這是何等眼光，何等抱負！關於計劃的本身，在抗戰勝利還都之前，蔣總統曾邀集中國一流專家和工程師仔細檢討實業計劃中有關工程部門的細節，發現時間過去二十餘年，除極少數處因地形變動，或已有興建，稍事修改外，計劃的準確與概括性未因時間的差距而有改變。這一在廿世紀前認為絕無實現可能的「實業計劃」，經過二次大戰由於美國政治家的觀念改變，也變為不僅可能，而且成爲一時的風尚，大家爭着去行。你能否認他的眼光，不比他同時的政治家早二十年麼？

至於要把這兩種相反的經濟組織，用他的原語「調和此兩種人類文化之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世界之文明」，在西方文獻中具有與此相同觀點者，我最早看到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麥凱福教授 Robert McIver 在一九五二出版的一本名為「對民主政治之經濟挑戰」 The Economic Challenge of Democracy 的專題講演，以後才有所謂混合經濟的名稱，我國父持此見解最少比麥凱福教授早二十年。

生存是基本人權

這一世紀是人類世界變動最大的一個世紀。變動的發生除兩次大戰而

外，要算三十年代的經濟恐慌。今天領導另一壁壘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首次世界大戰的產物，是對當時世界經濟秩序的一大挑戰。

蘇聯經濟能使美英資本主義受到影響，是它從一九二八以後施行首次五年經濟計劃。在美英兩國爲失業問題傷盡腦筋之時，蘇聯突然發出人力不夠的呼聲，這對美英工業高度發達國家不僅是一極大諷刺，而且成爲整個經濟秩序的一大威脅。

這一威脅把美國近百年來的傳統觀念也打破了。二次大戰以後普遍了解的社會安全法案，最早是在俾斯麥時代的德國試辦，英國繼起做行。在英德失業保險已甚普遍之時，美國人以爲他們地大物博人稀，得天獨厚，沒有預防的必要。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經濟恐慌稍見轉機，才開始提出失業保險的法案。凱恩斯的「一般理論」是以解決三十年代的失業恐慌爲研究對象，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不久，首先在美國掀起了研究浪潮。不管其是否曾和羅斯福總統當面談過這些問題，但在羅斯福總統任內興辦的許多不願預算赤字之公共工程，不能說不是受到凱恩斯的影響。這種作法美國人在三十年代以前是怎樣也不會想得到的。

在二次大戰期間英國鑒於和蘇俄並肩作戰，彼此經常接觸，難免不受其思想滲透，等不到大戰結束，先於一九四二年由貝惠理治勳爵公佈他們準備戰後立即實施的社會安全計劃。這一案是從生育補助開始，到退休恩俸，喪葬津貼，包括失業保險與疾病受傷之治療種種，使人生從搖籃到墳墓，統在政府照顧之中。

在講究社會安全成爲一時風氣，美國只要一經發動，便走在其他國家的前面。自一九三五年由國會通過安全法案，經過一九四五和一九五六的兩次擴展，把經營農業和多數獨立經營者暨軍人包括在內。在美國靠工作生活的人，今日除自由職業的醫生而外，百分之九十都已受到安全法案的保障（公務員另有規定）。

這是一種觀念上的改變。以前一個人在生活上遇到困難，也可以向地方政府請求救濟，這叫作 Social relief，是救濟性質。現在是認爲既然有人，便有生存的權利。政府給予各種方式的幫助，是他應有的權利。生存權之被世界公認，我國父也是最早強調的一人。他在講演民主主義時，

便說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人民有向政府要求衣食住行的權利，政府有供應人民衣食住行的義務，並且認為這是評論一個政府好壞的標準。他在說此話時，很少人不認為這是一種妄想，甚至哥倫比亞大學有一教授說他的民生主義是膚淺的經濟學 *sophomore economics* (1)，可是現在大家都已視為當然，可見國父的眼光確是走在世界前面。

跟着這一觀念的轉變，經濟上許多措施都在跟着改變。美國原是自由企業的國家，自從一九三五以後，接連有許多經濟法案，如限制工作時間，規定最低工資，補助收買農產品等等，都是限制人民的經濟自由，加重政府的經濟責任（去年尼克森總統的經濟措施更是不在話下）。記得在我的小學和中學學生時代，只聽到老師常說生命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現在生命價值仍是有增無減，財產的價值則已今昔異勢，再也不能和生命相提並論。

在艾森豪作總統時，赫魯雪夫曾到美國訪問，代表總統招待他的是麻州作過副總統候選人的洛奇 *Henry Lodge*，他們曾討論過美國和蘇俄的經濟問題，洛奇和他說，美國的經濟久已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經濟的人本主義 *economic humanism*。經濟目的是要使人人都能得到適當的生活。如要達成這一目的，他們經由直接稅的作用，逐漸使到美國中產階級人數大大地增加。今天美國人口已超過兩億，如把這兩億人照財產分成十組，其最貧和最富的一組，人數大致相等，其餘一億六千萬人可以說大致都是中產階級。這才是美國真實的力量所在。我們看到美國平素有許多從表面看好像非常嚴重的問題，如國內的種族糾紛，少年犯罪的增加，以及社會道德的墮落等等。在別國有一於此，立刻可以造成顛覆後果。美國則因社會的經濟結構非常健全，即使具有這些毛病，共產主義在這裏仍無法得手。

美國人絕對擁護他們的私有財產，他們最大的成功却是能使私有財產社會化。他們最大多數是住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耕重自己的土地，有近三千萬人購有各種各樣的公司股票，這一切一切把社會的階級觀念也沖淡了，從前把有生產工具的人叫做有產階級，沒有生產工具級的叫無產階級。現在許多工人有了自己公司的股票，你說他應是無產階級，還是有產階級呢？

我們 國父從未說過反對私有財產的話，也從未說過反對別人發財。

相反地，他總是鼓勵大家發財，要大家投資工業，興辦工廠，促使中國現代化。他說，他的民生主義就是發財主義，是要大家發財。其意是說，中國工業化後，生產力增加，人民購買力跟着增加。這樣又可促使生產的人擴充生產，僱用更多的工人，工人的收入增加，生活也就自然會跟着改善。他這樣鼓勵大家發財的見解，也和當前的世界思潮不謀而合。

英國有一位名陶納 *R. T. Tawney* 的教授，在這一世紀初期曾以「平等」為題，寫過一本小說，是這一題目的權威之作。出版之後經過二十年，在二次大戰結束，他檢討這二十年間人們在這一方面的思想上的變動，只增加一章，將原書再版發行。他指出在首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對百萬富翁和特權階級都是抱着憤怒和嫉視態度，口口聲聲說要平等，只有把他們的拿出來，把享受特權的人讓他飽嘗人間的痛苦滋味。可是經過二十年後人們對平等的看法，已不再是打倒有產階級和特權階級，而是提高一般人的生活，使大家都享有，都能享受從前認為是奢侈品，只有有錢人才能享受的生活。這一對平等觀念的改變，也和我國父生前主張要大家發財，也就是說和美國已經做到的私有財產社會化的做法，是一樣的。

陶納的結論不僅對美國社會有如是看法，對英國的社會結構也同樣看出和此類似的改變。英國在一九五二年財政大臣克里埔斯勳爵 *St. Stafford Cripps* 逝世時曾發表一次公報，以紀念克里埔斯勳爵任內的成就。這公報說，在克里埔斯就任之前，英國人除去所得稅而收入每年超過八千鎊的，包括克里埔斯勳爵本人在內，共有六千多人。經過六年之後，除去所得稅個人每年收入仍超過八千鎊的只有八十六人。其他低收入的人則已普遍提高，許多在從前認為只有富人能有的汽車，現在英國的技術工人也開始有了。電視、冰箱則已由奢侈品變為舒適品，再變為必需品了。近年英國的戲院觀眾，勞工階級逐日增加，對藝術品的欣賞，也逐漸普遍；假日出國旅行，領略瑞士山景和地中海的風光，也已蔚為風氣，不再是貴族的特權階級獨有的享受。

思想淵源孔孟迎頭趕上西方科技補中土不足

自三十八年因共禍猖獗，大陸淪陷，以國民黨一度容共，對國父所持

立場，曾在國內外引起誤解，因此對其思想背景，值得加以探討。國父生在十九世紀後期，亦如同時的知識份子，涵濡于中國的儒家學說。以居處濱海，易與西方文物接觸，從接受西方科學，至認識西方社會的困擾，以及那時即已孕育的社會革命，在中國正是新舊衝突，在西方則是各派社會學說爭奇鬪艷之時。國父的思想是在這時長成，也是跟着時代變化而成長。在和西方社會有更多接觸，他對西方思想政制的偏好，自然也會發生變動。

這是世紀交替，變動正多的時代。在西方政治或思想領袖之中，也很少有人在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以後的思想，會和在此以前完全一樣。國父也和許多其他敏感的領袖一樣，在威爾遜和列寧等大聲疾呼之時，會覺到他們創導之新的學說頗能動聽。不過國父比之西方其他領袖受到的影響可能還要少些，因為他的意識形態，主要是從舊時中國的意識形態生出來的。

認識國父的立場及其思想體系，他在民族主義講演中描繪的輪廓可以概括他的全部思想。他熱愛中國文化，讚揚中國人的固有道德，及先民憑其智能對世界物質文明所作的貢獻。但他承認中國有許多缺點。中國人在世界進入工業時代而停滯不進；具有民主政治精神，而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自稱民阜物豐，無所不有，每年流出十二萬萬元而束手不知對策。他為彌補這些缺點而採擷外國的長處，就外國文物制度斟酌損益，加上自己創見，使其更能適應中國的需要。在他致力革命的長時間內，雖亦有時受到外面變動的影響，但是這種一貫的思想輪廓，服膺以孔子為中心的儒家學說，以迎頭趕上態度接受西方的科學與工業技術，則始終未有變動。

他在民國元年即對中國社會黨指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無法實現。民國十三年講演民主主義時，又對容共時期雜有共產黨員的聽眾，把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從唯物史觀，價值學說，經濟演變，暨階級鬥爭諸理論，駁斥無餘。假如他的思想雜有任何馬克斯主義成份，是不會這樣做的。

他對歷史社會和進化的看法，是從民生着眼。因人類要求生存與更好生活，社會才能引致百工，講求生產。生產是適應需要，需要的產生是由於人們生活改善，有了新的購買力。生產本身並非目的，而是達到另一目

的之一種手段。所謂另一目的，就是滿足人們的消費，提高生活程度，以充實人生，使生存更有意義。他指出「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求生。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

因為生存是共同的，必須融洽和諧，互助合作。所以他對進化的看法，認為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只適用於一般生物。生物界的現象是鬪爭以求生存，不因時間不同而有差異。人類進化是以互助為原則，他解釋互助說：「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這是自明之理，人們鑒於戰爭之日益殘酷，為避免戰爭，從本世紀起，即不斷以各種方式之國際組織與合作，藉相互訪問觀摩，從溝通情感，培育友情。雖仍不免兩次大戰，痛定思痛，仍認定互助合作為改善國際關係之唯一途徑，不因遭受打擊，減少信心。

共產主義自列寧領導之布什維克在俄國取得政權，即改變戰略，轉向經濟落後，政治不安定，社會秩序凌亂國家，進行顛覆。當中國初有共產黨組織，正是軍閥割據，民生凋敝，青年反抗政權，亟思改變之時。頗有國父及其創導之三民主義在外來思想龐雜，知識青年徘徊瞻顧情況下，指出中國革命正途在建立民有，民治，民享國家，得以集中力量，統一中國。尤其是民十六混入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乘中國革命進展，企圖竊黨權，如非黨內服膺三民主義之忠實黨員，冒死與共黨搏鬥，可能共黨已於此時攫取中國政權。

(註一) 林白樂教授在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接受中國國立政治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的講演詞，政大印成附有中文翻譯的小冊。

(註二) Nathaniel Peffer, China, The Collapse of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0, P. 155. 勃發氏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為當時知名的中國通。在他的書中說三民主義對社會分析，比較政治理論尚有好評，對經濟學則詆為淺薄。

(註三) 政府遷臺後，美國大使藍欽曾對我政府表示，國父民生主義講演中曾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最易引起誤會。